

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正确路线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保证

——从商鞅变法谈起

北京市总工会 工人理论组
北京供电局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总结和认识商鞅变法的历史，及变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英明教导。这对当前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有着现实的意义。

一

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在劳动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的基础上，生产技能和劳动工具都有显著发展。随着铁制农具的普遍应用和牛耕的推广，已经有了灌溉和施肥技术，农作物产量也有提高，这标志着生产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霸占着土地和垄断着新式生产工具，肆意摧残、屠杀充当劳动力的奴隶。奴隶们没有一点自由，只能在奴隶主的棍棒皮鞭下挣扎，因而对生产毫无兴趣。而奴隶主则完全过着剥削生活，骄奢淫佚不事农耕，成了纯粹的寄生阶级。又由于割据形式的存在，奴隶主贵族相互争权夺田地，连年混战，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切充分暴露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不适当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奴隶大批逃亡，奴隶起义连续不断冲击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社会日益走向摇摇欲坠频于崩溃的境地。在奴隶斗争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迫切要求冲破奴隶制的束缚，要求发展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并同奴隶主阶级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集中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他总结了以前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变法路线，把这一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商鞅变法的政治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并进而实现全国大统一。商鞅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所以强调“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令民归心于农”，一则可以富国，因为封建社会里创造财富的来源主要靠农业；一则可以强兵，因为“农者”朴实定居，他们把身家性命都固着在土地上，平时耕作土地，战时也会为保护土地奋力杀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就要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就要“战”，战既要大量的兵源，又要充足的粮食，而这两者的源泉都在于“农”。“农”与“战”紧密联结在一起，就形成了商鞅变法中的农战政策。然而，当时的秦国是“一人耕而百人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这是奴隶制统治和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是实现农

战政策的障碍。因而必须变“农者寡”为“农者众”，必须从根本上摧垮奴隶制度，剥夺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否定儒家思想，这就确立了商鞅“变法以治”的思想。这条“农战”、“法治”的路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适应革命和前进的需要，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商鞅变法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建立以奖励军功和农耕的二十等制。规定有爵位便可以委予相应的官职。这对奴隶主贵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却为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广开了门路，新兴地主阶级能耕善战，就可以授爵委官直接参与朝政，在国家机构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商鞅进而全面推行县制，重编户籍，把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组织，直接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些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有效地扫除了奴隶主贵族左右国家政权的势力，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对政权的控制，使秦国比较稳固地建立起地主阶级专政，这对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商鞅变法前，井田制虽逐渐被破坏，但标志奴隶主贵族对土地世袭、垄断特权的封疆、阡陌仍然存在，为了彻底否定奴隶主这一特权，商鞅在经济上实行“开阡陌封疆”，鼓励垦草开荒归为己有，从法令上承认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措施迅速地扩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占有土地，进一步发展了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这对于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战胜奴隶主阶级进一步确定和巩固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占有形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商鞅又用三世不服军役，十年不征田税的“徕民”政策，吸引邻近诸侯国的人来秦务农，大力发展封建经济基础，用“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倍其赋”的税役办法，使家庭单位尽量划小，巩固一家一户的封建经济体制。

在思想领域里，商鞅主张去“奸”、去“虱”。他说：“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把奸民鼓吹的诗、书、礼、乐视为“虱”，对奸民不准委之官爵，并且“虽富无所芬华”。商鞅对奸、虱的态度是十分严厉的，他“燔诗书而明法令”，焚毁不利于农战的诗书，重罚奸诈，甚至把他们成批地迁到边远地区。商鞅鼓励人们专心一意从事农战，使人们养成求取上进、抵御外敌、质朴力耕的社会风尚，这些措施打破了重视诗书、游说的陈腐传统观念，树立了重农战的思想，使得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扎根，在政权内部成为统治的思想。

秦国由于坚决执行了法家的正确路线，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保证了变法措施的贯彻，在当时使得上层建筑适应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秦国的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十几年就形成了“家给人足”、“秦民大悦”、“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的局面。弱小的秦国一跃成“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有着强大实力的秦国。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法家路线在秦国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的重要转折点，这当然不得不使奴隶主贵族大为震惊，并进行拚命反抗。在变法过程中，他们哗然反抗，聚众闹事，并唆使太子驷犯法，以图阻止新法。商鞅指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大破“刑不上大夫”的戒律，果断施行新兴地主阶级专政，镇压了贵族的反抗。儒生们是奴隶制度的顽固维护者，他们反对农战，他们唯恐生产的发展冲击了原有的制度，唯恐国家的统一削弱了分封割据势力。鼓吹农业是“小人”干的事，“礼教”才是“君子”所为，不农不战也要守信礼教，鼓吹不搞农战，国贫国弱都没有关系，搞了农战，破坏了奴隶主的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那用不了几天奴隶主就要亡国了。所以他们看来，善战、开荒种地都应服刑问罪，这正暴露了儒家路线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实质。商鞅发扬法家反潮流的无畏精神，大造其反，公开倡导“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他提出的法令、制度都以农战为出发点，粉碎了儒家思想对变法的干扰，才在历史上写

下了“商鞅变法”这不可磨灭的一页。

二

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变法后,奴隶制旧势力虽然多次反扑,商鞅也惨遭杀害,但秦法未败,商鞅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这条法家路线,一直被延续下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就是秦始皇继续贯彻这条路线的结果。西汉王朝初期的兴盛,也是“汉承秦制”的结果。社会革命促进社会生产,所以在这段历史期间,生产力蓬勃发展是一个显著特色。

科学技术成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法家以农为本,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自然地在商鞅变法后,秦国引水灌溉、治水防洪的水利技术成就就非常突出。赵老峪引洪灌溉区,就是当时修建的我国第一条不给黄河输送泥沙的河流,它一直沿用至今。闻名的秦国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的建成,更说明了法家路线对水利建设的促进作用,也说明了当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程度。

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是秦灭蜀,并把蜀地编为秦的蜀郡以后,在公元前 256 年,由郡守李冰主持开始兴建的。“中流作堰”是这个工程的特点。《水经》所说:“壅江作棚,棚有左右口,谓之湔棚”指的就是李冰所设计的都江堰,在灌县以西扼住岷江咽喉,在中流建筑大堰,把水流分成内、外两条江,经堰的左右流过。岷江沿途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经常泛滥成灾。中流作堰分散水流,既免除了洪水成灾,又便利了灌溉和航运。都江堰能“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使原来的蜀地“水旱众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在都江堰的建设过程中,劳动人民还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调节水流的六字诀,和设立“水利”测量水位等重要的治水经验。

第二个大水利工程郑国渠,从陕西泾阳县西北,开凿运河沟通泾水与焦获泽,再从焦获泽开凿运河,经三原、富平、蒲城等地进入洛水。渠长三百多里。主持修渠的水工郑国,本是韩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妄图以修渠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使秦国无能进行统一战争为目的派到秦国劝说修渠的。尽管这一阴谋后来被秦国识破,但当时执政的秦始皇意识到“渠成亦秦之利也”,对于发展农业、富国强兵有深远影响,并未中断施工。同时水工郑国也被秦的繁荣兴旺所感动,愿“为秦建万代之功”。这样,一个能拦截沿途水流扩大水源,有输水渠,干、支渠,退水渠整套完整灌溉系统的郑国渠终于在公元前 246 年修成了,受益面积大约为现在的 280 万亩,受益地区单位面积产量也大有提高。“于是关中成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郑国渠在秦统一六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秦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后,接着进行开发岭南的事业。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严重影响了各路大军的行动,秦始皇决定“凿渠运粮”。公元前 214 年凿通了灵渠,灵渠通过湘江和漓江,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联接起来,成为世界上最早建成的一条人工运河。灵渠分南北两段,总长 34 公里。建渠时吸取了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经验,选地适当,设计精巧,结构完整。它采用了左右迂折延长流程的办法,减少比降,降低流速,蓄水通舟灌溉。灵渠又称“陡河”,它为了集中比降,提高水位,以利航运,在渠内广设陡闸。据有关记载描述:“渠内置陡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陡门,则复闸之,俟水积,以通南北之舟。”陡门的设置,使灵渠能浮舟过岭,实为古代一大奇观。灵渠在秦开发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到秦以后,也是促进中原和岭南交通往来、互通有无、巩固南北统一的重要纽带。

冶铁业的兴起,也是商鞅变法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它为广泛开垦荒地、深耕

细作、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开山凿石,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统计,当时七国共有采铁场三十七处,而秦国就独占十处之多,证明了秦国冶铁业的发达。在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铁犁中,只有镶铁口的铁口犁,而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农具中,却出现了长二十五厘米的全铁犁铧,这又证明秦国当时已经开始使用大型铁农具。开山凿石、修河筑路,没有钢的出现是不能胜任这些工程需要的,这更进一步证明铁器的用途之广和质量之高。腐儒们曾攻击秦国“重利”,从煮盐、冶铁方面取得大量财政收入。但他们所谓“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却正好说明了当时冶铁业的高速发展。在秦国冶铁业的基础上,汉武帝建立了全面的盐铁官营制度,使西汉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铁器大发展成为可能。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有成排的炼铁炉,它们因用途不同,呈现各种型状,并按型状和用途,分别排列在一起。除炼炉外,还有熔炉和锻炉,工序集中、设备齐全。从秦到西汉我国已经开始用煤作冶铁燃料,解决了提高炉温的关键问题。并且还发展了“百炼钢”技术,这些都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冶铁业的进步在支持农业发展的同时,兵器也普遍以铁器代替铜器。法家的农战思想,为水利、冶铁业开辟了道路,水利、冶铁业的发展又为农战思想的贯彻创造了物质条件。还应指出,法家主张统一,这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起伏绵延几千公里于祖国北部山区峻岭之脊,是秦始皇为统一的需要,把春秋战国时各国修筑的分段长城连接而成的。黄河大堤,在割据状态下,各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也是分段筑堤。地势低下的齐国,最先在离河二十五里的地方沿岸造堤,把洪水推向对岸的赵、魏两国,赵、魏也相继造堤,从此河堤内五十里宽阔地带的人民便越发处于黄河的蹂躏之下。更有甚者,诸侯国交战时往往以水代兵,使两岸人民饱尝水患之苦,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秦始皇统一后,“决通堤防”,除去壅塞(决),疏浚通畅(通),联结各段旧堤,建成黄河防洪大堤,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生产。规模宏大的驰道,也是在建立起统一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之后,应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仅北面从现在的包头到甘肃一线就长达一千八百里,而且东通河北、山东,南通江浙、湖北,遍及江湖和沿海地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驰道交通网,为秦巩固国家统一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一系列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还有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等事业,都是法家统一路线的产物。

“虽山川如故,而景物全非。”商鞅变法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正是法家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而法家路线之所以能占主导地位,又正是因为这条路线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革命的路线,它不仅符合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取得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归根结底,正确路线是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保证。

三

只有在正确路线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生产力才能发展,科学技术才会出现新成果。这一规律已被历史所验证。

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革命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必然反映到科学技术领域中来。不同的路线,产生不同的影响。

反动阶级鄙视生产,破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由他们复辟倒退的腐朽本质所决定的。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他们贩卖和鼓吹孔老二的反动说教,为的是给人民套上精神枷锁,诱骗

人民听天由命,做大自然的附庸、做他们的奴隶。反动阶级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蛊惑人心,有时也会把自己打扮成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维护者,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但只要把他们的伪装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看,其阻碍革命和破坏生产、破坏科学技术发展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恶毒诅咒法家农战政策的孟轲,经常把“农桑”挂在口头上。可是,他那一套“自经界始”恢复井田制的反动谬论,揭穿了他满口“农桑”的真实含义,是复辟奴隶制度、镇压革命。林彪及其死党,贩卖“唯生产力论”、“电子中心论”等,也正是这类黑货。他们别有用心地抽掉革命的内容,片面夸大生产力、夸大电子科学的作用,企图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要性,否定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基本路线,阻止社会前进。他们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对待革命和生产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是扼杀科学技术发展的刽子手。

革命阶级重视生产,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并把它看作是发动群众创造物质财富,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的必要途径。建国二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组成三结合的科学技术实验大军,浩浩荡荡,气势磅礴地冲向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可喜成果。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党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展示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工业以大庆为榜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大破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播送《东方红》乐曲的红色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放”出了地下滚滚石油,石油自给有余;工人阶级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远洋巨轮,穿洋过海,乘风破浪;一桥飞架,南北变通途的南京大桥,屹立在万里长江上;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密切联系西南地区的成昆、湘黔铁路,以及新落成的刘家峡水电站,……。工业战线,从天上到地下,从海洋到陆地都闪烁着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晶莹,把祖国大好河山点缀得更加壮丽。

农业以大寨为榜样。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业技术更新,高产捷报频传。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西藏高原种植冬小麦,出现亩产1,400斤的记录,百万翻身农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了世界奇迹。广大贫下中农在攀登农业技术高峰,为粮棉增产连年丰收作出了贡献。

工农业大好形势鼓舞了科研工作者。他们在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医学工作者,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创造和运用了针刺麻醉;高能物理研究人员,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研究基本粒子内部构造,提出“层子模型”的新理论;数学工作者,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一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业绩;几十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通过化学途径,合成了具有全部生活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而列入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的胜利归功于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才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也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有力地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科学技术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伟大祖国在本世纪就能够并且一定能够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